

第 一 编
语 言 文 化 区

古代汉语方言区划的拟测

对于古代汉语方言的区划，没有历史文献可供直接参考。前人也很少讨论和研究这个问题。实际上，除了有人曾利用扬雄《方言》的简化材料画过《前汉方言区域图》以外，还未见过有关古代方言区划的论著发表。

在历史文献中虽然找不到有关方言区划的直接记载，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依据下述几方面的材料，从现代方言区划出发粗略地拟测出古代方言的区划。第一，各类文献如史籍、字书、韵书、经籍注疏、笔记杂谈当中有关方言分类的零星材料；第二，历代方言学专著如扬雄《方言》、郭璞《方言注》等；第三，历代移民材料；第四，地方志中的方言材料；第五，历代行政区划；第六，历史地名。我们利用上述材料拟测了《诗经》时代、两汉、西晋（永嘉之乱前）、南宋和明清（局部地区）的方言区划。下面分别加以探讨。

《诗经》时代诸夏语言区域

《诗经》的时代前后拉得很长，大约从西周初年一直到春秋中叶，共有五个多世纪。诗三百篇只有少数作品可以考见创作年代，其中最早的作品可以算是《豳风·破斧》。诗中说到的“周公东征”是公元前 1114 年前的事。最晚的作品也许是《陈风·株林》。这首诗说到陈灵公和夏姬的暧昧关系，这事在《左传》宣公九年和十年有记载，发生在公元前 600 年或 599 年。

古代文献对《诗经》时代方言的地理差异只有一些零星的简略记载，很难据以划定当时的语言或方言区域。如《礼记·王制》说：“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这“五方”的确切地域何所指，不得而知。但可以说当时肯定存在着相互不能通话的不同语言或方言。《礼记》中的这一段话是我国古代文献中对语言地理差异的最早记载。

正因为有方言存在，所以当时流行类似于清代官话那样的“雅言”。《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字借为“夏”。“夏”是西周王畿一带的古名。所以当时的“官话”即是王畿一带的方言，也即是周室所用的语言。士大夫所作的诗和外交场合上所用的语言都是“雅言”。当时的外交场合常常有赋诗言志的事，所以各诸侯国的士大夫不仅都会做诗，而且大家在诗中所用的语言必须相同才能相互“言志”。在朝、聘、令、盟等场合也必须有一种统一的语言。“雅言”对于周天子与各诸侯国的联系和各诸侯国间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当时或后来的经典著作也都是用雅言写的，如《易传》、《论语》。

《诗经》的《国风》部分是按产生的地域分篇的，包括有以下十八个地域：周南、召南、邶、鄘、卫、王（东周）、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雅（即“夏”，西周）、鲁、宋。

《国风》之外还有二《雅》与三《颂》。《小雅》和《大雅》都是西周王畿的诗。西周王畿在今陕西中部。三《颂》中的《周颂》是西周王朝的作品，当产生于王畿；《鲁颂》是今山东鲁国的作品；《商颂》是周代宋国的作品，地当今河南东部及江苏西北部。

二雅和三颂都产生于上述创作国风的十八个地域之内。《国风》诸篇中的《王风》、《周南》和《召南》不是国名。《王风》是东周境内的作品，地当今河南中北部。《周南》是周公统治下的南方地区，大约北至汝水，南至今长江北岸的汉水和长江交汇处。因为《周南·汝坟》说：“遵彼汝坟”（“坟”是“堤”的意思），又《周南·汉广》

说：“汉之广矣 不可泳思。江水永矣不可方思！”《召南》是召公统治下的南方地区，大致南至武汉以上的长江北岸。因为《召南·召有汜》说：“江有汜”“江有诸”“江有沔”。此外的十五国风均出于各诸侯国。所以《诗经》的采集地域是可以大致推定的。

《诗》三百篇虽然是各地民间的诗歌，最初当然是用各地方言传唱的，但是后来编集时却是经过士大夫整理加工的，所用的语言是统一的雅言。正因为《诗经》的语言内部有同质性 所以今天我们研究《诗经》的语音系统 仍然发现三百篇的韵部系统是一致的。汉语上古音的系统研究到目前为止 主要的材料是《诗经》和谐声字。对上古音的系统虽然至今还没有一致公认的结论，但是各家对上古韵母系统的构拟已经趋向一致。《诗经》语言内总的同质性是没有疑问的。所以我们在《诗》三百篇内部并不能考见当时的方言歧异情形。

在先秦文献中对语言歧异有明确记载的地域是：楚、齐东、南蛮、戎。可见当时这些地方语言的特别引人注目。下述几条材料可以说明这些地方的人跟中原一带是不能通话的。

《左传·襄公十六年》 戎子驹支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 费币不通 言语不达。”这里的“诸戎”大约在今山西、陕西北部和甘肃地区。

《孟子·滕文公上》：“今也南蛮 𪚗舌之人 非先王之道 子倍之师而学之 亦异于曾子矣。”“𪚗”是伯劳鸟。这是说南蛮人说话像鸟鸣 当然是不知所云了。春秋时吴人获卫侯 卫侯归 效“夷言”。这夷言就是吴语 大约也属于𪚗舌之语。

《孟子·万章上》：“此非君子之言 齐东野人之语也。”齐东当今山东半岛东部 是莱夷所居地 至今胶东方言仍较特殊。又，《颜氏家训·音辞篇》：“夫九州之人 言语不同 生民已来 固常然矣。自《春秋》标齐言之传，《离骚》目楚词之经 其较之初也。”可见当时齐言与其他方言的差异是很引人注目的。

《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这说明当时齐、楚语差别很大，非置身当地人之中不能学会。

《左传》也注意到楚语的差异。《宣公四年》说：“楚人谓乳谷谓虎于菟。”这两个词都是基本词汇。据考证“于菟”是古代藏缅语言的汉字记音。古代巴蜀多楚人，与荆楚关系特别密切。秦灭巴蜀以后，蜀人始通中原地区，言语颇与华同。

西汉刘向所著的《说苑·善说》记载了一首春秋时代榜枻越人所唱的歌，这首歌当时曾用汉字记音，并且用汉文作了翻译。可见当时的越语不经翻译不得相通。据考证这首歌所使用的语言跟壮语关系密切。可见当时的越语并不是诸夏语言的一种方言，而很可能是壮侗语族的母语。古代的吴、越是异国而同族，两国的语言应该是相通的，都是古越语。这一点从先秦两汉的历史地名也可以考见。

总之，戎、吴越、南蛮、齐东、楚这些地方的语言是诸夏以外的民族语言，燕、狄、巴、蜀、淮夷等地的语言也很可能是非夏族语言。我们拿这些边远地域和十五国风采集范围相互考证，拟测了一张《诗经》时代诸夏语言区域图（见本书正文后附图 1-1-1）。

当时“楚”的地域应该是汉水和长江中游地区，其中长江以北地区跟《周南》所涉及的地域有重合之处，这一带很可能有民族和语言的混合。稍晚些时候屈原所作的《楚辞》的语言显然不是一种异族语言，但是《楚辞》中的不少成分也明显地跟同时代的古汉语不同。譬如《楚辞》中常用的虚字“兮”用法就很特别。《诗经》也用“兮”字，但是用得较少，并且用法与《楚辞》不同。

《诗经》中的“兮”是叹词，在句中表示感叹的语气。例如《伐

檀》：“坎坎伐檀兮 置之河之干兮 河水清且涟漪。”译成现代汉语是：“坎坎地砍那檀树呀 把它放在河边哪 河水清清泛微波哪。”“兮”字相当于“呀”、“哪”。

《楚辞》中的“兮”字用法跟《诗经》截然不同 大都不用作叹词。如《离骚》开头的几句：“帝高阳之苗裔兮 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 惟庚寅吾以降。”又如《九歌·国殇》：“带长剑兮挟秦弓 首身离兮心不惩。”其中的“兮”字都不可作叹词解。

《招魂》中还有一个“些”字 用于句尾 可能是表语气的 不见于《诗经》。如“得人肉以祀 以其骨为醢些”；“增冰峨峨 飞雪千里些”。

楚辞中的一些特殊成分说明它的语言底子可能跟《诗经》有所不同。沈括《梦溪笔谈》说：“今夔峡湖湘南北江僚人 凡禁咒句尾，皆称‘些’ 乃楚人旧俗。”现代彝族巫师的咒词和彝民的歌词每两句后都有“啊-梭-只”三个垫衬的音节。其中的“啊”和“梭”有可能跟楚辞中的“兮”和“些”是同源的。“兮”的古音据闻一多的考证也是“啊”。下面是两段彝巫咒词和彝民歌词。

咒词 人畜清吉求葫芦（即求祖灵葫芦默祐），
五谷丰收祈土主（土主指南诏王细奴逻），
啊-梭-只！

歌词：两个斑鸠诉苦情，
满肚苦水吐不清。
啊-梭-只！

在我们所拟测的诸夏语言区域中应该是有方言差异的，不过很难在文献上找到直接的记录。《左传·文公十三年》中有一条宝贵的材料可以证明当时秦、魏的方言不能相通。《左传》该处先述晋六卿聚谋于诸浮，使魏寿余伪以魏叛者诱士会还晋，而后说：“秦伯师于河西，魏人在东，寿余曰：‘请东人之能与夫二三有司言者，吾与之先。’使士会。”士会是东人，能说东边魏地的话，所以秦人不得不

派他去。这一段话说明当时秦、魏之间的方言差异还很大，通话不便，所以魏人才有可能借需要通话之机诱使“士会还晋”。

两汉时期方言区划

我们在上节中已提到在《诗经》时代周朝是以王畿的方言作为雅言。“雅言”大致相当于现代所谓“民族共同语”。当时各诸侯国都以雅言作为标准语，所以方言的向心力增强了。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存在一种标准的共同语，那么方言差异比没有标准语要少一些，这是一般的通例。

但是到了战国时代周王朝已经衰微，周室也已失去共主的地位，以周室的方言作为标准音的雅言就自然取消了。所以《说文解字序》说：“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已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此时各诸侯国都以本国首都的方言作为标准音，所以战国时代的方言比春秋时代更加趋向歧异，也就是说方言的离心力增强了。在《诗经》时代各国方言本来就是有差异的，《说文序》强调战国以后“言语异声”当是指两方面的情形，一是战国以后雅言不复存在，所在各国异声；二是本来就有的方言歧异因雅言不复存在而愈演愈烈。

秦始皇兼并六国，实施“书同文”的政策。文字虽然统一了，但由于方块字并不是拼音的，所以文字的统一并不能促使语言也走向统一，反而使方言的分歧发生惰性，而长久保留下去。因为使用不同方言的人们可以借助相同的文字表达和交流思想，朝廷对地方的政令，地方对朝廷的报告及各地间的重要交流都可以借助统一的文字进行。汉代的经师们只是热衷于解释先秦的经典，亦即周朝的雅言，并没有编辑韵书之类提供标准音的书。政府的语言政策可以说是任其自然，士大夫沿用先秦典籍的语言写作，而各地的人仍使用各地的方言。

这种情况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才有所改变。《颜氏家训·音辞篇》说：“自兹厥后，音韵蠹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折衷的结果是出版了一些韵书。不过其时处于分裂状态，编韵书的人都是以所在国的首都方言为标准音，并不是制定通行南北各方的标准雅言。如晋吕静之的《韵集》、南齐周颙的《四声切韵》等都是如此。可惜这些地方韵书都失传了，我们无法知其面貌。

关于汉代方言地理分布并没有直接的文献记载，只能根据扬雄的《方言》还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的方言材料作些推测。

《方言》的体例涉及方言地理者有以下三种：一是指明某词是通语、凡语、凡通语、通名、四方之通语；二是指明某词是某地语、某地某地之间语；三是指明某词是某地某地之间通语。

《方言》在许多地方提到“凡语、通语、凡通语、通名、四方之通语”，这些概念只是指不受方言区域限制的词汇。我们并不能据以断定当时已经产生一种语音、词汇、语法同质的汉民族共同语。可以肯定的只是当时的各方言间存在许多共同的词汇。至于某地某地之间的通语，是指通行范围较广的词语。

《方言》所引的地域名称有战国名，如韩、魏，有民族地区名，如朝鲜、东瓯，有州名，如幽、冀，有郡名，如代、汝南，有县名，如曲阜、巨野，还有以山水为标志的地名，如淮汝之间、海岱之间。可见提供给我们的是不同地理层次上的方言材料，并且各地的材料也远不是整齐的。从现代方言地理学的眼光来看，这些材料很不理想。所以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这些材料来确定方言的亲疏，从而据以划分汉代的方言区划。林语堂曾根据《方言》所引地名的分合推测汉代的方言可分为十余个区域，即秦晋、郑韩周、梁西楚、齐鲁、赵魏之西北、魏卫宋、陈郑之东郊、楚之中部、东齐与徐、吴扬越、楚荆楚、南楚、西秦、燕代。

值得注意的是《方言》提供的材料以秦晋为最多，在语义的解

释上也最细。这说明作者对以西汉首都长安为中心的秦晋方言比较熟悉,也说明秦晋方言在全国占最重要的地位。还有,《方言》将秦晋视为同一个区域,但是在春秋战国时代,这两地的方言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见上面所引《左传》有关秦魏方言的材料),可见到了两汉之交,由于秦人的东进,秦、晋的方言已经糅合而一了。春秋之前秦晋语言还偏在西方,在诸夏语言区域中并无重要的地位,到了两汉之交秦晋的方言一跃而占显要地位。在秦汉之后汉语的最终形成和后来的发展中,秦语起了关键的作用。后世的北方汉语就是以当时的秦晋和雒阳一带方言为基础,逐渐定型的。

《说文解字》中指出使用地点的方言词共有 191 条,每条的解说体例和《方言》相仿。这些条目中与《方言》重出的有 60 多条,不过互有详略,并不尽相同。这些条目所提到的方言区域或地点共 68 个,列举如下(括号中的数字表示被提到的次数):楚(23)、秦(19)、齐(16)、关西、河内、北方(各 6)、关东、汝南、南楚、秦晋、周(各 5)、益州、蜀、朝鲜(各 4)、江淮之间、东方(各 3)、梁益、陈留、东楚、陈楚、吴、齐鲁、宋魏、沛国、东齐、江南、南阳、南方、西方、吴楚、海岱之间(各 2)、凉州、伊雒而南、江淮而南、晋、青齐、沅、南昌、宋齐、淮南、北道、弘农、宋卫、上谷、南越、陇西、韩郑、楚颖之间、青徐、河朔、吴楚之外、匈奴、宋楚、颖川、三辅、宋、陈宋、巴蜀、洛阳、潞、汝颖之间、九江、淮阳、东夷、宋鲁、晋赵、燕代、沅州、齐楚(各 1)另有“方语”、“俗语”、“通语”各一条。

《说文》所提供的方言材料远比《方言》少,提到次数最多的区域是“楚”,共 23 处,这说明当时楚方言的差异可能是最明显的,其次是“秦”,19 次(不包括秦晋并提的 5 次),这说明在许慎的年代,秦晋方言也是很重要的;再次是齐,16 次,也是很突出的。

《方言》和《说文》中的有些材料可能不是汉语的方言,而是当时少数民族的语言。如《方言》中提到的东齐青徐之夷、羌狄、阺、东胡;《说文》中提到的朝鲜、南越、匈奴。

扬雄生活在两汉之际，许慎是东汉人。从两书都以秦晋为重点来看，两人生活年代可能相距不远。

根据《方言》和《说文》的有关材料 汉代的方言区域不妨认为如附图 1-1-2 所示。图中的朝鲜、北狄、西戎、越、东齐、淮夷是少数民族语言区域。

西晋时期方言区划

西晋末的永嘉丧乱造成我国历史上北方汉人的大南迁，也造成南方汉语方言区划格局的大变化。现在先看这个事件之前汉语方言区划是怎样的。史籍中的移民材料、郭璞的《方言注》和《尔雅注》及《世说新语》的有关篇章都是研究这个问题的极好材料。

在汉末离乱和三国纷争中，北方人口也有相当规模的流动。这些人口流动应当引起北方方言的混化，造成方言地理的变更。

《后汉书·董卓传》：“卓……迁天子西都长安。初长安遭赤眉之乱 宫室营寺 焚灭无余。是时唯有高庙 京兆府舍 遂便时幸焉。后移未央宫，于是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这是由东而西的流动。接下来：“帝入关 三辅户口尚数十万。自催、汜相攻 天子东归后 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 羸者相食。二三年间 关中无复人迹。”数百万洛阳人又一时星散，其中大部分一定又随皇帝东归。这样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应当会使汉代关中和中原一带的方言发生混化。

又，《三国志·蒋济传》载：“……太祖不从而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同书之《吴主传》又云：“初 曹公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徵令内移 民转相惊 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十余万 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这两处记载说明汉末时已有大量北方人给吴语区带来北方的方言，又说明汉时淮夷、江淮、徐夷的方言或语言至汉末时已基本南移。三国以后进入江淮一带的当是

淮河以北或中原一带的方言。

同书之《卫凯传》又说：“关中膏腴之地 顷遭荒乱 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这暗示汉末时关中方言已扩散到荆州地区，而使荆楚方言的地盘缩小。

再同书《管宁传》曰：“管宁 字幼安 北海朱虚人也……天下大乱，闻公孙度令行于海外，遂与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辽宁。度虚馆以候之。既往见度 乃庐于山谷。时避难者多居郡南 宁居北 亦无迁去 后渐来从之。”推想当时汉语已扩散到辽宁。

汉末人民的迁徙 史籍所载不过是其中一部分而已。迁徙是断续的 时而发生的 也没有一定的方向 有在北方内部的转移 也有迁到南方或北方边地的。这种迁徙促使了汉语的混化和统一。特别是北方方言内部的统一。这个过程可以从晋代郭璞的《方言注》中观察到。郭璞常常拿晋代的方言和扬雄时代作比较。扬雄时代有许多还是某某方域语的条目，到郭璞时代都已成为通语。这类条目原来大多是北燕、朝鲜、东齐、海岱、燕、代、关西的方言 其中尤以楚语变为通语为多，举例如下。

娥、嫫 好也……赵魏燕代之间曰姝。注 昌朱反 亦四方通语。

茫、矜、奄 遽也。吴扬曰茫。注 亦今北方通然也。

曝、晒 干物也。扬、楚通语也。注 亦今北方通语耳。

凡草木刺人……江湘之间谓之棘。注：《楚辞》曰：“曾枝剌棘”，亦通语耳 已力反。

这种方言变通语的现象的产生，一是因为东汉时期内地长期的安定局面，使各地人民联系交往密切频繁，首都和文化发达地区的方言容易成为通语。另一方面，边疆地区游牧部族的入侵，又使边地人民内迁，这也加速方言的融合。其次是三国时期战争频繁，人民经常流徙播迁，也造成方言的混合和统一。

不过当时的吴语和楚语跟北方的方言差异还是很大的，直到南北朝依然如此，所以北方人对这两种方言特别敏感。《世说新

语》和《北史》中的几段记载很能说明问题。

《世说新语·排调篇》云：“支道林入东 见王子猷兄弟还 人问：‘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顶乌 但闻唤哑哑声。’”又曰：“王大将军年少时 旧有田舍名 语音亦楚。”楚语听起来像白顶乌哑哑地叫，可见别地人根本听不懂。

《排调篇》又载：“刘真长始见王丞相……刘既出，人问王公云何 刘曰：‘未见他异 惟闻作吴语耳。’”问的是“听见说什么了？”但是答复却是“只听见说吴语而已。”可见刘真长也听不来吴语。

《北史》载：“丹阳王刘旭呵骂僮仆 音杂裔夏 虽在公坐 诸王每侮弄之。”方言的差异不仅一听而知 而且颇受时人鄙视 居高位者亦不能幸免。由此可知上推晋代时，楚语吴语与中原通语的差异肯定很大。

郭璞在注《方言》和《尔雅》的时候 也模仿扬雄的办法 指出晋代的通语和方言的地域差异。郭璞所提到的地域，有以下几个（以出现次数的多寡为序 只出现一次的不计）江东、荆楚、东齐、关西、河北、巴蜀。

根据上述材料和分析，当时的汉语方言大约可以分为以下几区 河北、东齐、关中、中原、巴蜀、吴、楚。其中的“关中”包括汉时的关东和晋时的关西。《方言》注中提到的关西方言共七条 汉时皆是关东方言，可见晋时关西、关东方言已混化。我们所拟测的西晋方言区划见附图 1-1-3。

宋金对峙后期方言区划

对宋代的方言区划，历史文献并没有直接的记载，也没有像汉扬雄《方言》、晋郭璞《方言注》和《尔雅注》那样资料集中的著作可借以分析、判断。但是仍然可以通过下列三个方面来拟测当时的方言区划：一是唐宋时代的移民材料；二是宋人笔记中有关方言类别

的零散记载；三是对比北宋时的行政区划和现代方言的区划，寻求相重合的部分。

移民对于方言区划的形成和变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后文另有详述。

宋人笔记中关于方言区划的记载虽然很少，但是从中仍可看出当时对方言类别的见解。他们的见解间接反映方言区划的事实。现将有关材料举例如下。

沈括《梦溪笔谈补》卷 1：“经典释文 如熊安生辈 本河朔人，反切多用北人音 陆德明 吴人 多从吴音 郑康成 齐人 多从东音。如‘壁有肉好’ 肉音揉者 北人音也。至今河朔人谓肉为揉 谓贖为树。”

黄鉴《扬文公谈苑》：“今之姓胥、姓雍者皆平声。春秋胥臣、汉雍齿、唐雍陶皆是也。蜀中作上声、去声呼之。盖蜀人率以平为去。”

刘攽《贡父诗话》：“周人语转 亦如关中以中为蒸 虫为尘 丹青之青为萋也。五方语异 闽以高为歌 荆楚以南为难 荆为斤。”

沈括《梦溪笔谈·杂志》：“闽人谓大蝇为胡螻 亦螻之属。”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 6：“四方之音有讹者 则一韵尽讹。如闽人讹高字 则谓高为歌 谓劳为罗。秦人讹青字 则谓青为萋 谓经为稽。蜀人讹登字 则一韵皆合口。吴人讹吴字 则一韵皆开口。他仿此。中原唯洛阳得天地之中 语音最正。然谓弦为玄 谓玄为弦，谓犬为遣 谓遣为犬之类 亦自不少。”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 14：“且四方之音不同 国墨北惑字 北人呼作谷木卜斛 南方则小转为唇音。北人近于俗 南人近于雅。”

从这些零散的材料中至少可以看出如下两点。

第一，北方方言作为内部较一致的方言大区已经形成。北方话作为一个整体方言的概念是到宋代才在史籍上出现的。从先秦经典到汉扬雄《方言》、晋郭璞《方言注》在述及方言的地域时都不是把北方话当作一个单位来看的，而只是把北方话分成好些块，分别

加以讨论的。这说明北方话内部分歧还很大，一般人还没有形成“北方话”这个概念。到北宋沈括才首次提出“北人音”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开始意识到“北人音”可以作为一个单位提出来讨论。隋陆法言《切韵序》虽然已经提到“南北是非，古今通塞”，但是其中的“南北”恐是泛言，并非确指北方话、南方话。

当时的北方话内部大致又可分为秦、中原、河朔、蜀四个小区。值得注意的是唐宋时代的文献中已不再提到东齐、淮夷、汝南之类较小的地域了。

北方汉语在两汉时代可以说还是纷歧异出的。这从《方言》所举的众多地域中也可以看出。但是经汉末丧乱、三国纷争、五胡十六国混战，北方人口流动的规模和数量都很大。这种历史背景促使了北方汉语的混化，后来经过隋唐宋三代的长期稳定发展，北方汉语进一步互相融合，内部一致性大为增强了。“北方话”作为一个方言大区也就是在唐宋时代才逐渐明确起来的。北方话在汉语中的基础方言的地位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正式确立的。在唐宋和唐宋之后出现了许多以当时北方口语为基础的文学作品，如诗词、小说、话本等。

第二，宋代的南方至少有吴、荆楚、湘和闽三种方言存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唐宋时代开始才出现关于闽人方言的记载。“福佬”（闽人）这个民系的概念也是在唐代开始出现的。闽语字音有文读和白读的区别。唐宋时盛行科举制度，为了适应考试的需要，读书人就从北方话中借来文读音。文读音的流布是闽语趋向一致的向心力。

至于宋代各方言区的界线，其中某些部分也是可以构拟的。我们发现现代汉语方言区和次方言区的界线，有一大部分是跟南宋时代的一级或二级政区的界线是相重合的。这是因为宋代政区划界时已明显地考虑到人文因素，方言的差异也是人文因素的主要内容之一；又因为现代南方方言的地理分布格局到南宋时已基本

形成，后世改变很少；同时南方二级政区界线相当一部分自南宋至清末基本不变，一级政区界线变化也不很大。政区界线的长期稳定促使政区内部方言的一致，而语言的变化往往落后于移民和政区的变迁，所以现代汉语方言区划和南宋政区界线相重合的部分可以拟测为南宋方言区划的界线。

以下对宋末方言区划的拟测方案加以讨论。

1. 吴语区

南宋时代吴语的分布地域比现代要大一些。大致包括今浙江省全部（上海市全部 苏南 除宁镇地区外）苏北的通州和海门 江西的婺源、玉山、上饶、永丰 福建的浦城。

今浙江省邻近福建的庆元、泰顺和苍南诸县南部的闽语是明代以后从福建输入的。

今皖南地区的铜太方言还保留全浊音，徽州方言全浊音已经消失 但是其他特征很接近吴语（浙江的严州方言类此）在现代方言地理区划上归属未定。我们认为整个皖南地区方言的底子还是古吴语。今天它的面貌变得跟其他地区吴语大不一样的原因大约有两方面：一是僻远的山区长期与外界处于近似隔绝的状态；二是另有一些地区受到官话的侵蚀，南朝在这一带曾侨置南豫州安顿北来汉人。特别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官话更是一涌入。在南宋时代整个皖南地区（除西北角的当涂之外）应该是属于吴语区的。江西的婺源 今方言近徽州 不近赣语 亦应与徽州同处一板块中。从历史政区看 婺源在唐和两宋也一直属徽州（或歙州）

福建的浦城方言属于吴语区由来已久。浦城正当古代浙闽交通的要冲，第一批由陆路入闽的汉人即是东汉末从江南过浙南经浦城到达闽北山区的。永嘉丧乱、中唐、唐末五代以及两宋之际的北来移民依然沿着此路入闽。所以浦城不仅从东汉末年就有吴语居民定居，并且后来跟吴语本土也一直保持联系。比较今天的浦城话和浙江吴语的异同，可以发现它不仅与毗邻的浙西南接近，

并且兼有浙北的特点。

今天吴语的西南部边界沿浦城往北进入江西的上饶、广丰、玉山。这三地的方言都还保留全浊音。从历史上来看，玉山是唐前期分衢州的常山和须江等县所置，本来跟衢州方言就同处一个板块之中。上饶、广丰虽然从未与衢州同处一个二级政区之中，但是可以推测这一带在历史上早就说吴语，并不是晚近时代吴语才扩散到江西境内的。从南方方言地理演变的大势来看，在东晋至隋唐客家人第一次南迁到达江西中部之前，吴语的西境应远在这三县以西。客家先民的南迁改变了江西原有方言的性质，并且迫使吴语的西境向东萎缩。从现代江西上饶、广丰、玉山三地全浊声母分布图上还可以看出浊音向浙江一侧萎缩的现象。据此，南宋时吴语的西境可包括饶州的东半和信州全部。中唐时虽然有不少北方人移居饶州，但多在西部平原，东部山地应仍是原住吴语居民的地盘。

如果比较南宋时代和西晋以前吴语在长江南岸的分布，一个最突出的差异即是从镇江到南京、当涂一带已经变为北方话区。

在西晋末年以前江南是清一色的吴语区。永嘉丧乱后渡江南下的士族和百姓据不完全统计多达九十万人。东晋南朝设立侨州郡县以安置南迁的汉人，当时设立的侨州有司、豫、兖、徐、青、并等州，侨郡、侨县就更多了。这些侨郡、县大部分都集中在当时的首都建康附近。据《晋书·地理志》统计，这一带的侨置郡、县有二十多个。从建康至京口一线，以山东、徐淮一带来的人最多，所以在京口（今镇江）侨置徐州。在建康以南的姑熟（今安徽当涂）则侨置豫州州治。侨置州后来都加上南字，变成南徐州、南豫州。南豫州的地域虽然南至徽州以北，但是北来流民和士族大约多聚集在接近建康的和沿长江的姑熟、襄垣和繁昌一线。这一点从现代皖南一带方言更接近北方话也可以想见。

南下汉人带来的北方话和江南原有的吴语差异很大，以致影响到当时的政治生活。据史籍记载，北来的士族之间必须说洛阳